

当代电影中西南少数民族舞蹈的审美呈现

■文/郭璟怡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必然与特殊的地域、人口、文化相联结,形成地域性、人文性的特征,从世界电影史的角度上,便形成了以国家为界定的电影风格,而在中国电影的视野内,西南少数民族电影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典型。在中国当代电影的作品群中,不乏以西南少数民族为表现主体的优秀电影闪耀史。舞蹈,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因其视觉性、观赏性和表达性与电影形成天然的耦合关系,在一系列西南少数民族电影中,对少数民族舞蹈的呈现举足轻重,成为电影美学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部分电影中,民族舞蹈本身甚至成为了经典。近年来,少数民族舞蹈元素更是被引入到其他电影类型中。电影传递的不仅是西南少数民族舞蹈的表层样貌,更是通过舞蹈所蕴含的民族风情、民族文化、审美情趣等。通过电影镜头,少数民族舞蹈的独特之美进一步得到呈现与传播,通过电影故事和舞蹈画面的互动讲述,西南少数民族舞蹈包含的审美意趣也得以呈现。

一、民族性呈现:群体与自然

从典型的西南少数民族电影上来看,从早期的《五朵金花》、《阿诗玛》,到近几年的《碧罗雪山》、《云上石头城》、《侗族大歌》、《云上太阳》等,都是优秀西南少数民族电影代表。纵观这一系列作品及其中的民族舞蹈呈现,我们不难发现,电影既是在呈现舞蹈的本来面貌,又是通过舞蹈呈现去还原民族环境,刻画故事场域,体现生动而颇具艺术的生活本相。如我们所知,我国少数民族在地域分布上总体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我国西南部,由于山水纵横形成的天然屏障,使得原生态居住环境更为完整,从而使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群居性”更为明显,而电影选取西南地域的典型少数民族作为表现对象,势必还要还原这种“民族群像”。从《五朵金花》中的白族聚居地云南大理;到《阿诗玛》中的撒尼族小镇“阿着底”;或是《碧罗雪山》中的傈僳族、怒族居住的深山;亦或是《云山石头城》中的纳西族名城宝山石头城和《侗族大歌》中的西南小镇、《云上太阳》中的贵州丹寨,我们都能轻易地接收到这些地域的民族性——在这些地域中,地方少数民族几乎代表了所有的人口,他们身着一民族的服装,甚至使用特殊的民族语言相互交流,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二、故事性呈现:生活与仪式

舞蹈作为视觉艺术,尽管可以作为电影艺术的有效表现手段,但舞蹈是舞台艺术,它的表达具有形式性、夸张化,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抽象化特点,而电影是镜头艺术,讲求的是真实感、故事性、内容具化,这和舞蹈的特质存在某

程度上的矛盾,但对于少数民族舞蹈来说,这种矛盾却能被轻易的化解,这源于少数民族的舞蹈不同于其他舞蹈的特性,即生活性与习俗性——通过分析少数民族的舞蹈,我们不难发现,各民族的舞蹈直接取材于该民族的生活劳作,部分舞蹈动作是来源于平日的生产与劳动,是在生产劳动的行为动作的基础上,进行变形、美化而形成的。

在《阿诗玛》中,小黑听到阿诗玛的歌声,向河边浆洗的少女们询问阿诗玛在哪里,顽皮的少女们在河堤上站成一排,一边将手上的布随舞动起来投入到水中,一边回到小黑的问题,这一段既是舞蹈场景,又是劳作场景,既是在做舞台化的呈现,又是在生活化的场景中叙事,将阿诗玛的故事讲述得更为动人。同样是在《阿诗玛》中,我们还能看到创作者灵活运用少数民族舞蹈与生活之间的转化关系,对人物的肢体动作进行舞蹈化的设计;在摔跤大赛前夕,年轻人们去找阿诗玛,大家手弹月琴,脚步整齐跳动,一路而来,而从剧情中可以看出,这一段中跳动的舞步,其实只是代表一个“呼朋引伴”的走路、跑动的过程,这一设计从撒尼族舞蹈动作中迁移而来,是舞蹈在电影中的“日常化”,细节之处造就了这部民族歌舞片整体流畅和自然。在《云上太阳》中,导演用了大量的远景去描绘黔东南苗族人民在丘陵水田中劳作的身影,与后来苗族在山间歌舞相呼应,把劳作和舞蹈的密切关系寓于其中。

除了日常劳作,民俗活动同样也是民族舞蹈文化的源头之一,而西南少数民族传统舞蹈大部分都是用于节日庆祝及平时的民俗活动,这一点,在当代电影中 also 得到很好的呈现。从《五朵金花》中的赛马前白族群舞,到《阿诗玛》中的摔跤大赛前后的撒尼族群舞,从《碧罗雪山》中木扒婚礼上的舞蹈,再到《侗族大歌》里婚礼的歌舞,《云上太阳》里的苗族舞蹈,都是在重要节日、庆典的设定下出现。对于《碧罗雪山》、《侗族大歌》这类本身不带有歌舞片性质的故事片来说,这样的舞蹈呈现形式既能透视少数民族最核心的文化,从舞蹈、到礼仪,到民俗,又能避免舞蹈参与电影内部叙事的突兀感。需要指出的是,西南少数民族舞蹈艺术也有一部分是源于各民族的宗教习俗,在《云上太阳》中,也出现了祭祀“神灵”的场景,充满仪式感的祭祀过程与黔东南苗族的舞蹈形成呼应。

(作者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2020级硕士在读)

电影产业投融资模式的创新

■文/兰曼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国家电影局2022年初发布的电影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全年电影总票房高达472.58亿元,票房和银幕总数占据全球第一位。但是电影产业的投融资水平和其迅猛发展的速度已经脱节。为了提高我国的电影投融资水平,激发行业的创新活力,我们仍需做出巨大的努力。

一、电影产业投融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随着经济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电影产业已经迈上了新台阶,为了提高电影产业在文化市场上的地位,应当继续加大资本的投入。现阶段电影产业的投融资机制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投资方式较为单一。在我国电影产业的投资方式主要是项目型投资,投资本金的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具体流程就是投资人在选中某个电影项目之后对该项目进行直接的资金投入,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为该部影片的代理人,全权负责对影片的制作和发行,一旦影片获得较好的收益之后,投资人就会对该部影片按照比例分成,进而收回自己的投资。这种投资模式是当下电影市场最主要的投资形式,结构较为单一,收益稳定性较弱,风险较高,长此以往将不利于电影产业的持续性发展;其二,投资不确定性较大,投资人在选择单个影片进行投资时,很难预知到该项目的潜在风险,投资不确定性较大。在电影制作方面,很有可能因为天气的变化和人员的流动等原因导致延长电影制作周期,增加电影制作成本,进而影响影片收益。就市场而言,所投资的影片是否符合观众审美和口味有待考验,投资风险的不确定性会在市场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演员而言,现阶段主管部门逐渐加强对于影视艺人的管理,严格惩治失德艺人,对部分失德严重的艺人采取联合惩戒的政策,因此电影的参演人员万一带入其中,该部影片很有可能会被下架或者遭受整改。这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都会给投资人带来较大的风险,投资人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电影产业投融资就会变得极其的艰难。

二、电影产业投融资模式创新对策探析

为了避免电影产业投融资过程中遇到投资不足、融资难的问题,应当拓宽多元化投资渠道,吸引更多资金加入到电影产业当中来。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起:

(一)国家方面

首先,建议出台相应的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把对于电影行业的投资手段、税收优惠等内容确立下来,从而进一步支持本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例如,在2016年11月份出台并于2017年3月份正式实施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就是国家针对电影行业繁荣发展颁布的一项专门法,这部法律更好地规范了电影行业的秩序,推动了电影产业的长远发展;使更多优秀的国产影片得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能够起到弘扬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前来中国旅游、住宿,从而促进国内经济水平的提高,因此在针对一些符合一定条件的国产优秀影片时,国家可以通过减免税收等政策来促使其更好地走出国门。

其次,政府在发挥促进和指导作用的同时,还需要加强与市场的结合。国家或地方政府可以建立电影产业扶持基金。基金来源可以从电影院、电视台等行业收入的税款,也可以是部分的电视广告收入、电影院的票房收入以及其他电影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等。该基金可以采取市场化的运作,主要用途是对电影发展有意义的各种项目予以扶持,比如对优秀剧本投入拍摄的扶持,对优秀影视作品制作发行的扶持,对院线放映的扶持,对面临困难的影视组织的扶持等,当前前提是要建立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的。

再次,完善电影行业融资配套体系。完善的知识产权评估体系对于实施电影版权质押融资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中小影视公司更是对此有着迫切的需要。

最后,加强对于电影文化彩票的发行。电影产业的投融资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找寻更多的投融资渠道来促进其发展。国家现在已有发行的彩票主要是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体彩和福彩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体育和福利事业的壮大,因此我们可以探索发行电影文化彩票,运用彩票所募集到的资金来投入到电影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企业方面

第一,发行电影理财信托基金。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要想进一步推进本企业的发展,改善自身产业投融资模式,必须加强与银行、证券、私募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建立专项信托基金。该信托或基金可以把购入的电影版权拆分成标准的份额,以理财产品的形式发售给对其感兴趣的投资者从而进行融资。

第二,建立互联网众筹模式。众筹指的就是在互联网上展示相关的创意作品或者真实事件,并对相关内容进行说

明,以此来获得大众的资金支持。同可能造假的“水滴筹”模式不同,互联网众筹为电影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一些小成本、小制作的电影,能够通过互联网众筹的模式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带来更好的信息对称,降低投资风险,构建投融资的良性互动,推动电影行业的更好发展。例如,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将未来可能会开拍创作的剧本公开在互联网上,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看到该电影的市场潜力和盈利前景,并据此估计风险,以此来决定是否进行投资。这种众筹模式使得电影制作更加公开透明,也能更好地吸引到投资者,从而增加了项目成功的可能性。此外这种主动参与型的模式还能够起到很好的营销作用,不断提升电影的知名度,从而提高电影的总票房。

第三,银行贷款的关键是建立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必须确立完善的信用担保制度。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要想实现规模化发展,仅仅依靠个人投资和互联网众筹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利用银行信贷。电影产业链很长,风险也很大,银行一般不轻易贷款,除非有必要的担保(如电影版权质押或其他资产等)。此外,建立合理的履约保证机制也是非常必要的。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可以找寻专门的履约保证公司对其进行评估,在履约保证公司出具书面保证、电影公司还款能力评估等内容后,将其提供给银行,进而获取银行贷款资金。

第四,资产证券化融资。例如电影行业的资产证券化融资就可以把影视公司的电影版权收入或者电影IP未来预期的收入等出售给SPV。SPV以这些未来的收入为支撑对资产的风险收益重组,然后在资本市场上以理财产品的形式发行相关证券或信托产品,一旦电影票房增长势头强劲,那么不但投资者会获得更多利润,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也可以筹措到更多的影视制作资金,进一步推动了电影市场的发展。

第五,其他融资模式。比如利用各地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融资。电影是具有一定的宣传作用的,所以电影的拍摄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当地的旅游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当地的就业率,所以制片公司可以和当地政府谈判获得其融资支持。再如电影广告的植入融资模式,通过电影的情节、道具、台词等植入广告,为电影制作进行融资。

目前我国电影行业的投融资渠道还比较有限,期望通过研究能为拓展我国电影产业的投融资渠道作出些许贡献,以促进我国电影产业更好地发展。(作者系集美大学诚毅学院经济系讲师)

红色电影对延安精神的弘扬

■文/刘凡超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此后的十三年间,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延安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心和战略要地。这一时期,我党一方面大力推进根据地建设,另一方面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争取全国政权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稳固根基。在这个过程中,我党不断总结经验,孕育出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的“延安精神”。时代是不断变化的,但精神的力量却是永恒的——新中国成立后,直至今日,延安精神依然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不断砥砺前行。不容置疑的是,精神力量的传承离不开文化产品的宣传与弘扬。自革命时期始,延安精神就与红色电影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延安精神之所以能在不同的时代历久弥新,新中国成立以来红色电影对延安精神的弘扬不可忽视。

一、革命与电影:延安精神与其红色电影传统

通过对延安时期革命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延安精神及其与红色

电影的关系。延安时期,我党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直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对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战争决策上的重大革命事件主要有——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战时期工作的总方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可能;1937年8月洛川会议;提出全面抗战的总方针;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同样是在1937年9月,八路军首次对抗日军,以山地战、运动战的方法配合正面战场友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1938年5月,通过对战争形势的深入分析,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成为中共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纲领性文献;1939年底—1940年初,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坚决抵制,成功守住阵地,随后迎来了百团大战的胜利,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广泛开展军民武装自卫战争,通过西北野战军的建设,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党的思想

路线、斗争精神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设完备。在生产方面,无论是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还是土地革命,都孕育滋养了共产党军民一体、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开拓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延安时期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从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到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我们的文艺事业开创发展,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事业迎来第一次发展高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被成功地运用到红色电影的创作中。而对于电影来说,这一时期里程碑事件当属延安电影团的成立——延安电影团成立于1938年10月,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这一机构集电影拍摄、放映功能为一体,是延安时期

重要的宣传力量。由于特殊时期拍摄条件和政治要求,延安电影团的创作以纪录片为主,其中《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新闻纪录片留名影史,这批电影作品真实记录了延安的革命岁月,通过电影大力弘扬了延安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新中国红色电影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重温与发展:红色电影对延安精神的弘扬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红色电影”创作迎来黄金时期,一方面,大量反映时代、贴近人民群众真实生活,展示革命精神风貌和英雄主义思想风貌的电影作品应运而生。另一方面,红色电影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内容、形式等方面不断变化,不同时期的红色电影呈现不同的艺术风貌。这其中,一批作品旨在通过重现革命生活,或重新唤起民众对于革命峥嵘岁月的记忆,或给出生于和在和平年代的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以历史真实教育,根本上,是通过对史实的再现与回顾,实现

延安革命及其精神的重温。

于是,延安时期革命史实和所孕育的延安精神就成为重要的红色电影题材——如:《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等表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畏牺牲、勇于战斗的革命精神;《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兼具根据地特色,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灵活运用地理优势,进行全民抗战的史实,不仅展现了根据地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勇于斗争的精神,更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暴风骤雨》则表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的艰苦历程,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寓于其中;《野火春风斗古城》更是将镜头对准了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近年来,最具“延安特色”的红色电影当属2019年上映的《周恩来回延安》——电影讲述了1973年6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应越南使团访问延安的要求,再次踏上延安这片革命圣地的故事。创作者在电影内部建立了两个时

《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声屏世界》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被列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学术期刊名单,是全国广播影视十佳学术期刊,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称号。《声屏世界》1988年创刊,全国公开发刊。

国内统一刊号:CN36-1149/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3366
投稿邮箱:jxspj@163.com jxspj@126.com
电话:0791-85861504 0791-88316904

